

●〔美〕张大卫 著

●王宏周 杜淑英 等 译



中流砥柱 各有千秋

——周恩来与邓小平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流砥柱 各有千秋

——周恩来与邓小平

〔美〕 张大卫 著

王宏国 冯守礼 邵原子
鲁丽娜 杜淑英 谢莉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一九八八·十一·北京



Chang, David W.
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uccession Crisi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Lanham, 1984

根据美国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中流砥柱 各有千秋

——周恩来与邓小平

[美] 张大卫 著

* * *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7 印张 160 千字

* * * *

ISBN 7-5043-0135-3/D·22

印数：1—50000册 定价：3.60元

序

本书的出版是由于我作为一个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事变的观察家的兴趣促成的，特别是林彪倒台以后，当周恩来在国内外事务中走上第一线的时候。“四人帮”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以前就决心继承他的领导权，强化了林彪下台的政治后果；相反，毛泽东本人似乎并不愿意正式或通过官方指控由谁作他的继承人。在周恩来领导下的70年代初是一个从文化革命的一片混乱中恢复出来的时期，也是中国由一个与美国敌对的时代向着建立友好关系的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周恩来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谈判家的作用似乎是无法取代的。同时不幸的是周恩来已经患病，因此，邓小平作为副总理重返政坛，分担了周恩来的大部分日常工作，并且规划了中国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进程，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最后一次露面时公开宣布的。中国的领导权更迭，归根结底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稳健政策的胜利，邓小平自1977年复职以后的行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他已经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似乎既要实现1911年革命，又要实现1949年革命二者目标的恢复与发展的新道路，尽管目前这一点还不肯定。

本书第一和二章叙述周恩来的个人以及革命生活，提出了许多未加分析的问题。第三和四章叙述邓小平的个人以及革命生活，读者无疑会认识到，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前后，都是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政府或党的机构所占的崇高职位不同，他们个人的性格、家庭背景以及成长过程亦有所区别。

最后一章企图根据历史观点重述毛泽东领导权的更迭，我含蓄地提出了一种可能会受到所有中国公民和社会名流欢迎的新的未来领导机构。周恩来和邓小平似乎明白非毛政策的国家建设的必要性。该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在现代中国力图成为一个工业化自由国家过程中的一个题目：“改革、革命和国共继续竞争”，今天，国共两党仍在竞争，以证明谁是更好的经济和政治模式。重要的是读者仍然深深记得，中国是如何渡过了袁世凯和军阀统治以及“五·四”运动影响下的困难时期，自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喊出“D先生和S先生”（民主和科学）以来，国共两党60年的内战和竞争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迅速的科学进步。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到本世纪末也许可能产生“D先生和S先生”的革命成果。

最后一章的第二部分触及20年代国共合作与分裂时期所显示出来的理论混乱和革命危机。周恩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稳健立场，他作为毛泽东危机的处理者，人们对他经常发挥的作用已进行过广泛讨论。毛泽东去世后以及从1977年复职开始，邓小平似乎决心采用周恩来的求实方法，他保证“少说空话，多作工作”。邓小平用以取代毛主义的是“实事求是”，他的“和平革命”的新时代，已经看到了“四人帮”受审，华国锋辞职，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基层民主选举，以及实验“集体领导”，然而对这个新时代的检验，则在于它最终应付多种挑战的能力，其中包括个人对自由的要求，教育和就业机会，控制人口增长，不断上升的消费愿望，以及党和官僚机构

的改革,等等。在结论部分我含蓄地提出,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使邓小平于1973年复职作他的副总理,筹划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进程,这就使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重返领导岗位,开创现代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时代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广泛解释的意义上,我第一次领悟到他们为领导权更迭作出的共同贡献;甚至在毛泽东去世前,他们已施展其领导才能,进行广泛联系,支持修正和调整未来的发展方针。他们不仅在国内事务中、而且在外交领域也进行了试验,例如,邓小平争取美国从外交上正式承认中国的谈判,就是一个重要成就,他此后于1979年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

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范围和内容,已经说明了邓小平的和平改革,说明了他及其拥护者正在国内外抛弃毛主义“继续革命”的道路。主张稳健政策领导人完全控制了党的领导权。胡耀邦在最近的党代会上进一步宣布,中国保证不在邻国推动共产主义革命和游击战争。十一次党代会的许多年迈领导人都已经让位,出任新设立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满怀信心的中共新领导,现在似乎决心推动国内的民主改革,同时在今后的几十年内维持最大限度可能的政治稳定。在外事方面,新领导在与两个超级大国的交往中,特别是关于减少苏联对边界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逐步停止向台湾销售武器方面,似乎将保持其独立立场。

我必须真诚地提醒读者,本书并不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传记,亦不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全面分析,它仅仅选择若干重大革命事件,用以说明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所遇到的困难和窘境。例如,我最后一章的目的即在于含蓄地说明其他领袖们(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可能如何影

响、甚至迫使周恩来和邓小平在 1949 年前后变成了革命的稳健人物。我分析的中心议题是,说明作为中国爱国主义者的周恩来和邓小平承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以及 1911 年民主革命的贡献。因此,作为讲求实效的革命稳健人物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的最后几年,悄悄地、不声不响地引导中国摆脱毛主义的激进主义。就深度和本质分析而论,这本著作不打算满足严格学术标准的需要,只力图预言一条和平改革的新道路,以及这种改革可能产生的结果,它确实可能同时实现 1911 年和 1949 年两个革命的目标。我对这样一个未来自由社会的信念是受很多因素支配的,尤其是下面这些:知识分子对否定自由的特殊抵抗行动,由于四个现代化成功而产生的技术管理力量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联系的日益扩大。1979 年以后,我通过旅游研究考察了中国的许多部分,这对我的信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全盛时期的许多西方学者,都低估或错误认识了党内以及知识分子中间对激进主义的抵制,因此,对 1949 年以后中国的事变,他们作出了很多错误的解释和预测。

总之,我相信中国未来的政治和政策变化,将更多受到内部力量和群众需求,而不是外部压力的影响,忽视这些力量和争取民主自由社会要求的任何未来中国领导人,都将会象毛泽东那样注定失败。不过,在中国实现这些民主价值观念需要几十年时间。

作为对本书价值的最后评论,我希望强调,邓小平和政府应始终注意满足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需要,始终注意加强法治。毛泽东左翼激进主义的失败有助于为党内的任何统治集团敲响警钟:不要不顾民众的意愿。过去 30 年经济以

及官僚主义的失败并非毛泽东一人之过,也不应该仅仅责备他个人。周恩来已经尽了他最大可能的努力,虽然对他也提出过许多应该的批评。现在是邓小平排除干扰,大踏步前进,加强和平改革,以实现 1911 年以来一切革命民众之要求的时候了。

张 大 卫

1983 年

目 录

序	(1)
---------	-----

导 言	(1)
-----------	-----

第一章 周恩来的政治传略：一个爱国主义的

革命家和忠诚共产主义者	(10)
-------------------	------

一、寻求新的独立生活的道路	(14)
---------------------	------

二、一个爱国主义的革命家和忠诚共产主义者	(19)
----------------------------	------

三、一位革命的谈判家和管理者	(31)
----------------------	------

四、在领导权更迭过程中的政治活动	(42)
------------------------	------

五、政治家的风度	(45)
----------------	------

六、结论	(54)
------------	------

第二章 周恩来逝世后的形象和影响

一、共产主义者的典范	(58)
------------------	------

二、具有典型学者风度的政治家	(69)
----------------------	------

三、人民的总理	(78)
---------------	------

四、结论	(84)
------------	------

第三章 邓小平：从基层干部到党的总书记

一、早年在中国和法国的生活	(87)
---------------------	------

二、从长征到解放战争胜利	(94)
--------------------	------

三、负责党的事务和政策实施	(98)
---------------------	------

四、讲求实效的马克思主义者	(105)
五、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09)
六、周恩来与人民解放军	(118)

第四章 邓小平走上新的领导岗位	(130)
一、第三次重返政坛	(133)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36)
三、逮捕和审判四人帮	(145)
四、为建立新的领导机构而斗争	(151)
五、邓小平复职与和平革命	(164)

第五章 以历史观点看革命领导权的继承	(173)
一、改革、革命与国共继续竞争	(175)
二、周恩来在处理危机时的作用	(185)
三、邓小平建立新型社会主义法制的 和平革命	(191)
四、以历史观点看领导权的继承	(208)

译后记	(216)
------------------	-------

导 言

对于 20 世纪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战略和关键性影响的，归根结底只有少数领袖人物：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每一个人都为其继承者或继承者们留下了必须予以解决的民族危机。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领导了这个国家新的领导机构，毫无疑问，这个领导机构将会在邓小平脱离政治活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同样，台湾的蒋经国先生在筹划和决定这个岛屿命运的过程中也经受了考验，这种命运与该国统一的危机密切相关。毛泽东的显而易见的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也许是、也许并不是他的真实选择。毛泽东在 1976 年 9 月去世之前，似乎曾采取行动力图延缓和最大限度地缩小这种更迭危机，他非常清楚由于他发动文化革命而引起的争夺权力的“激烈”派系斗争。到 1969 年，这种更迭危机已经十分明显可见，林彪被逼得似乎已经走投无路，策划了他的“571”武装叛乱阴谋。林彪的灭亡使周恩来和邓小平有可能重返政治舞台，改组仍然处于过渡阶段的新的领导班子，安排可望领导该国进入 21 世纪的最后一个领导机构的组成。

自 1966 年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周恩来的活动表现了他典型的讲求实效的态度。作为文化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能够保持其总理地位；他还成功地保住了他在政治局的位置，并且是党内仅次于毛泽东和林彪的第三个高级领导人。最重要的一

点在于以他为首团结形成了一个稳健力量，然而，周恩来在全国范围令人亲切的影响，他那不可多得的外交活动技巧，以及他作为总理的管理能力，却使他能够左右和调停政治分歧。和其他许多直言不讳反对毛泽东的人不同，周恩来作为派别斗争的调停者，他是在自己主动承担风险并且有意自我限制其主张的情况下工作的，他对自己在党和政府内的作用是满意的。林彪丧生之后，周恩来经常代表毛泽东讲话和行动，是他逐步使邓小平恢复了权力并取代他的作用。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还能够保护邓小平。1976年1月他逝世之后，权力之争发生了新变化，邓小平又第二次消失了。4个月以后的清明节，北京人民以令人感动的庄重形式悼念他，出现了“四·五”事件，使邓小平进一步受到牵连，蒙受耻辱，并且损害了他在党内的崇高地位；毛泽东重新使他处于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集团的压力之下。最后，我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运动期间了解到，“四人帮”虐待“敬爱的总理”，虽然他当时已病在医院。简而言之，对于这场权力之争的最后结局，周恩来在其逝世前后发挥了巨大作用。

相反，邓小平表现了一种不同的斗争风格。文化革命期间他被谴责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红卫兵全盛时期，他的家庭也遭受了极大痛苦。邓小平对于自己的直言不讳似乎总是无所畏惧，他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组织和管理者。邓小平可以很快承认可能有过的错误，指出改革的必要性；他每次重新掌权以后，又总是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针行动。从长远看，邓小平是一个注重理性的和稳健的改革家，象周恩来一样，他不是一个不顾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又敢于冒险为他相信正确的东西进行

斗争，所以自文化革命开始以后，他走过的是一条狂风暴雨般的人生道路，在“四人帮”垮台和他最后恢复权力之前，他已经两次失去权力。自1977年他最后一次被重新授予权力以来，他所进行的斗争便足以揭示出他的特点，他的决心，他的政治活动战略，以及他通过精心安排自己身后的新领导机构的更迭而体现出来的对中国未来的设想。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似乎竭尽了全力。他很少关心“黑猫白猫”的意识形态之争，只要猫抓耗子；对于他来说，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似乎不是一个值得论争的问题，如果这种修正看来是必要的、合理的和有实践意义的。1977年复职以后，他接着就向党的会议发表了讲话，发誓必须“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最近几年，邓小平已经领导党和国家走上了一条脱离毛泽东激进主义的路线，但又没有在意识形态方面明确提出背离毛主义的漫长道路。实际上，他从1956年起就在政治上否定了毛泽东的很多论点。邓小平已经提出了一条讲求实效的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观点把一切意识形态都置于受其实践效果所检验的地位。邓小平狂风暴雨般的经历，说明了他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急切心情，例如1971年，他在听到林彪摔死之后便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明他希望为人民工作，并且保证决不违背党的决定。毛泽东同意这封信的内容，并且批转全国学习，同时，他在1973年4月恢复其副总理职务之前，在受迫害期间，一直在工厂作为一名参加劳动和自我改造的干部耐心等待着。

最近几年，在邓小平的影响日益增加并且最终在党和政府内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那些在文化革命时期接受毛泽东激进主义的人，都已经被清除出了政治局，“四人帮”被投入

了监狱。一个为干部平反和恢复职务的努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展开，华国锋先生最终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他作为党的主席和国家总理的两个职位。令人惊奇的是，邓小平能够说服最接近于他的那些同事们从其高位上退下来，让年轻领导人掌握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力。这一切说明，邓小平已经巧妙地采取攻势，完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周恩来的风格相比，邓小平一向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采取行动的。邓小平在 1977 年复职之后所执行的就是他自己的政治活动的策略和战略。

下面的章节将论述和分析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他们的政治战略，以及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及其以后为政治领导权更迭所作的贡献。这种继承权的危机至少是在大跃进以后就开始了，它既是毛泽东本人领导权的危机，也是继承他的权力的危机。毛泽东并没有成功地选择其继承人，继承他权力的任务，是由周恩来和邓小平通过进行激烈的权力之争而一步步完成的。简言之，到 1981 年邓小平能够指引胡耀邦先生走上党的主席的岗位时，周恩来和邓小平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的未来还取决于邓小平不屈不挠地追求四个现代代，以及他在与美国和苏联关系中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战略。稳健的周恩来与邓小平所执行的有控制的与苏联对抗和慎重的与美国相互合作的务实政策，似乎能够为地区性和平与稳定形成一种较为强大的建设性力量。邓小平自 1977 年重新掌权之后就一直指导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这种稳健的领导似乎注定要继续其目前的进程，阻止预料不到的领导权危机。邓小平似乎还致力于和平的民主改革，调整和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他重视政治稳定，而不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这样的稳健领导，

最终可能超越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和毛主义的教条与僵化词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20 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非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将丝毫不会为之惊奇，他们 1919 年“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可能复兴并对该国未来的领导起指导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的政治和技术发展，D 先生和 S 先生（民主与科学）的意义仍然是完全贴切和适用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过去的一切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以及知识分子的第三种努力，都具有一个共同目标，即使中国成为一个摆脱外部帝国主义和内部团结统一的现代民主工业国。国民党政府没有实现这个民族目标；毛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由于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时期贯彻他们左的极端激进主义而超越了这个民族目标。只有中国共产党的稳健力量，似乎能够进行一种 1911 年以后历史延续下来的革命，希望实现这一共同的民族目标。1911 年以来，总的情况表明，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和创立一个工业国家，较之引进社会、政治和文化民主似乎要容易得多，例如，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的党派制度，以及政权的和平过渡，对于当代中国的领导能力似乎仍然是一种严重挑战。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殷切期望当前的稳健领导人，保证永远支持和平的和有秩序的改革性过渡，他们还希望当前的政府维护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继承这种人道主义文化，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必然会为“颓废”的西方思想所支配。在未来，无论哪一个政治集团可能领导这个国家，都应该允许中国农村的普通人民成为政治制度的参加者，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物质财富不应该被置之不顾。本世纪开始以来的许多革命领导人都曾经宣称他们支持普通群众，但是，群众却从未完全参与掌握他们的命运以及政

治发展进程。实际上，是毛主义的激进分子企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1911 年以来，在形形色色革命领导者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过程中，人民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用外国意识形态和组织技巧武装起来的党的干部和宣传家，到农村去教育并强加他们的革命事业与无知的群众，大跃进和公社制度就是这种不受农村群众欢迎的例证，它们是被强加于人民的。总之，农村群众在民主问题上并没有很多发言权。自 30 年代以来，属于中间党派的城市知识分子也没有充分行使其民主权利，以便对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常常是遭清洗的受害者，蒙受不白之冤，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的去世以及清洗“四人帮”之后，已经很容易看到激进的左翼分子反对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多么错误和不公正。的确，党的稳健领导所执行的平反错案和恢复干部职务的政策，有助于消除过去的不公正待遇；人们希望今日中国的稳健领导能够实行真正民主和群众充分参与。

正是出于希望有一个现代民主的工业化国家的愿望，许多人都欢迎周恩来和邓小平领导的稳健力量的政治胜利。共产党人最近对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所作贡献的认可，应该包括孙先生 1911 年革命的目标，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是由于外部帝国主义（例如日本侵略）和内部袁世凯叛变引起的军阀混战才受挫的。直到邓小平及其亲密的同事们，才继续了他们正确的改变方向和进行调整的措施，重新得到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支持。然而，本书仅限于努力认识周恩来和邓小平自文化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垮台以后的作用。就其教育和经历而论，这两个讲求实际的稳健人物之间有着明显差别，但似乎并不表现在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中

国的共同目标方面。这个事实使他们和毛泽东与“四人帮”有所区别。

例如，周恩来出身于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邓小平在作为勤工俭学生到达法国之前，并没有象周恩来那样受过很多正规教育。这两个人在运用交往技巧方面亦有颇大距离，周恩来在与其对手的接触中多采用说服的和间接的方法，相反，邓小平总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其对手。周恩来是一个调停家、一个仲裁人，而邓小平却是一个野战军战士和独立自主的计划者。周恩来的大部分经历是在国共谈判以及外交活动领域渡过的，而邓小平的国内经历却大为不同：他从1926年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开始，直到作为野战军政治委员、地方党政领导人、党的总书记和副总理等占据高级职务，并且参加了中苏对抗和中美和解的高级外交活动。他们两位都与人民解放军有密切关系，并且都有丰富的党政管理经验。然而，周恩来在1935年以后的历次权力之争中，毫无疑问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由于他在党内的影响以及他的外交能力，所以对毛泽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邓小平亦非常忠于毛泽东，但是，他常常就政策和党内事务问题无所畏惧地与毛泽东争论，尽管他似乎从来也没有不服从他的领导。是毛泽东去世以后派系权力之争的环境，才使他重新复职，成为周恩来在林彪死后更加有力支持的稳健领导人。

此后几个章节，将致力于表达我对权力之争漩涡中周恩来与邓小平这出“戏”的说明，特别是邓小平在1973年4月至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期间，为什么、以及如何痛恨左翼激进分子。大部分分析都是以我1979年和1982年在中国旅行并且与很多中国人平心静气交谈所得到的材料为基础的。